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懷疑論集

(下)

羅素著

嚴既澄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懷 疑 論 集

(下)

著 素 羅
譯 澄 旣 嚴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集論疑懷
冊二

譯澄既嚴 著素羅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機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CEPTICAL ESSAYS

By Bertrand Russell

Translated by Yèn Chi Chê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懷疑論集下冊

第十一章 政治上的懷疑主義之需要

（本文是著者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倫敦政治經濟學校的演說辭）

英語的民族的特性之一，就是對於政黨的鉅量的注意和信仰。在英語的人民中，有一個很大的百分數的人都真個相信他們現時所身受的種種壞處，假使某個政黨能夠佔到政權，便都可以立時完全醫治好。政局上的鐘擺之所以能夠永久擺動着，這便是一個理由。一個人懷着這種信念，去投票選舉他心目中所認為政局的救星的那個政黨，結果卻使他依舊不免感受到種種的痛苦；於是他對這個政黨失了信心，而轉過頭相信其他的一個政黨必能把耶穌躬親御世的一千福年帶給我們。像這樣地逐一試驗，等到他把所有的政黨都試遍了，對於牠們都已失去了信心之時，他自己也已經變成了一個老人，而去死不遠了。那時便有他的兒子來繼續保持着他的少年時代的

信仰，而政黨的迭相雄長的把勢也就長此繼續下去，決不致完全失去了牠們的擁護人。

我現在想對諸位提出的意見就是，如果我們想在政治上做成一點好事，我們必須另以一種不同的途徑來觀看牠。本來在一個實行民主主義的社會中，一個想獲得政權的政黨一定要製出一種宣傳的政策來訴諸全國人民，併且必須是能夠喚起全國中的大多數人民的反應的。其實像這樣的訴諸國民的宣傳，依於我們今世現存的民主主義，越是能夠獲得廣遠的成功，其結果必且越是有害些；關於這一點的理由，我們將要在本文的辯證的進程中繼續揭發。因此，凡是重要的政黨大概都不需要有一個有實用的程目；而若果我們真有什麼有用的計畫要被通過的，那只有憑藉於政黨的政府以外的其他的機關來通過或採納牠。怎麼樣去把任何的這樣的機關來與我們今日的民主主義聯合起來，這實是我們目前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我們今日的社會中，有兩種很不相同的關於政治問題的專家。一方面是各黨中的實際的政治家；其他的一方面，則是種種的專家，大體是政務的公僕，但也有專門的經濟學者、財政家、科學的醫藥學者等等的人。這兩種的專家都各自有他們的專門的技巧。前一種的政治家的技巧在乎猜

度什麼東西可以使得人民去認爲是於他們自身有利益的；而後一種專家的技巧則在乎實實在在地計算出什麼東西確是於人民有利益的，併且附上必須同時能夠使人民也認爲如是條件（這個附帶的條件也是主要的，因爲凡是喚起人民的激烈的公憤的計畫很少是真個於民有利的，不管這些計畫包含着多大的價值）。在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中，一個政治家的力量完全要依託於他之採用那種在平常人的眼中覺得是對的意見。其實我們若果去堅持政治家必須心志高抗，以專誠擁護那些有智識的人所認爲善的事情，那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因爲他們如果真個去如此做，那他們就必不免爲他人所推翻。而且他們在窺測羣衆的意見中所需要的直覺的技巧，並不暗含着去造成他們自己的意見的技巧，因此，許多政治上的最能幹的人（從政黨的觀察眼光說）大都要置身於下述的一種地位中，就是，很忠誠地去擁護大多數的民衆所認爲善的計畫，但是這些計畫卻正是專家們所認爲不好的。所以我們絕不能使政治家對於任何的道德的誥誡感到興趣，除了不受賄賂的一種性質最粗淺的教訓以外。

無論什麼政黨的政策存在着，一個政治家的政治上的宣傳總是訴諸一部分的國民，而他的

敵黨的政治家則訴之於相反的一部分的國民。他的成功就在乎把他的一部國民化爲全國中的大多數。至於那種訴於全國中的各部分的人民的計畫——就是全國人民都歡喜聽的計畫——那便是大有成爲各政黨的共同根據之可能的，因此，牠對於政黨的政治家便成爲全無用處的了。由是，政黨的政治家所集中注意於其上的，便是構成他的反對黨的擁護者的核心的那一部分人所厭惡的那些計畫。而且一種計畫，無論是怎麼好的，對於一個政治家依然是無用的東西，除非他能夠替牠找出一些理由來，這些理由，必須是能使尋常的人民聞之信服的，當他在演說臺上對着民衆把牠們宣說出來之時。由是我們可以找到兩個條件，是政黨的政治家所致力的計畫必須具備的：（一）凡是政黨的政治家所提出的計畫必須是顯示出爲國中的一部分的人民謀利益的；（二）這些計畫的論證一定要帶有極端的簡樸性。這自然是不能應用於戰爭的時期的，因爲在戰爭的時期中，政黨的衝突都要暫時休止，以期有裨益於對外的競爭。在戰爭的時代中，政治家的技術都要施用於一批向來對於各政黨不作左右袒的中立者的身上，這些中立者都是與尋常的對於現行政治的懷疑的投票人相符協的。上回的世界大戰已經明示出，恰正如我們所期的，民治

主義對於向這些中立者宣傳的事情，曾給與我們以一種很好的訓練。這也就是爲什麼讓民治主義來戰勝了這回的大戰的主要理由之一。牠不免喪失了牠的固有的和平性，那是真的；可是這是別一個問題。

政治家的特殊技巧就在乎明察出甚麼熱情最容易被喚起，以及一經喚起了之後，更要怎麼樣去防阻牠們不使有害於他自身和他的同儕。本來在政治中，也如在金融的問題裏一樣地有一條葛列士漢姆的定律（Gresham's law）〔就是經濟學上的劣幣趕走良幣的定律。葛列士漢姆是英國的財政專家；一五一九——一五七九〕存在着；一個另外懷抱着比這些目的更爲高尚的目標的政治家必不免被人趕走，除了在那種很稀罕的時期（大都是革命的時期）裏，在那種時期中，理想主義是與某種以自私的熱情爲根據的有力的運動互相聯結起來了。併且，因爲政治家是分立爲互相敵視的各團的，他們的目標也就在乎去把全個國家依樣地分畫開來，除非他們遇到了那樣好的運氣去遇到了戰爭，因而把全國團結起來，而抵抗其他的一個國家。他們原是依託於「全無意義的喧囂與擾亂」來生活的。他們永不能夠注意於任何的很難解說的事物，或任何

的不含有分裂的東西（這分裂或是介乎兩國的，或是在一國中的），或任何的足以減低全體的政治家的力量的東西。

至於第二種的專家則是與前者完全兩樣的一種模型。按之常例，他總不是一個以政治上的權力為他的目標的人。他的對於政治上的問題的自然的反應，並不是要去探究什麼東西可以獲得人民的歡迎，而是去考察出什麼東西是比較有利於民。在某種方向上，他具備着異常豐富的專門智識。假使他是一個政務官吏，或一種事業的領袖，則他還要富有關於各個人的經驗，對於這些人之如何進行其分內的工作和行動，他大有以成為一個聰敏的裁判官。這些都是很有益的情形，因而使得他的在他自己的專門範圍裏的意見很能夠受到他人的尊重。

可是，按之常例，他也自有他的相關聯的缺點。因為他所有的都是專門化的智識，他或者不免要過分重視他自己的一個分部的重要。假如你繼續去探問一個科學的牙醫生，一個科學的眼醫士，一個心病專家，一個肺病專家，一個神經病專家等等的人，而徵求他們的關於你的身體的健康的意見，他們將要給與你以怎樣去防阻這種種的特殊的毛病的勸告。假使你完全依照着他們的

每一個人的勸告去做種種的防備的事情，那你將要覺得你的每天裏的二十四個鐘頭只好全部消費於保持健康的手續上，再沒有餘閑的功夫去把你的健康利用於別的事情上了。同樣的情形也很容易發生於一個政治的專家的身上；假使全體的政治專家的勸告都被採納了，那將不免使得全國的人民都沒有了餘暇的功夫去過他們的平常的生活。

這種能幹的政務官吏的第二個缺點，就生於他的在暗中去施用說服人心的方法。他或則把說服人民使之變成有推理力的可能性過分地估高了，或則太過歡喜去應用那種祕密活動的方法；這種方法的應用常常引誘着那些政治家去莫名其妙地通過一些嚴厲的政策。照平常的事例看來，這種政治的專家，在青年時，常會犯前一種錯誤，而在中年的時期裏，而常會犯後一種的錯誤。

專門家的第三種缺點，如果把他看作一個具有執行的能力的人，便是，他並不是一個能夠判定羣衆的熱情的人。他對於一個委員會常常是十分了解的，可是他對於一羣暴動的民衆，則理解力很少。倘使他發見了某種的政策，凡是具有相當的智識而又懷着善意的人都覺得牠是好的，那他就志在必行；他決不會省悟到：如果這種政策已經獲得了羣衆的擁護之後，忽然有一些強有

力的人認為這是於他們自身有損的，他們立刻能夠攪起羣衆的感情到如此的一個程度，簡直可以使這個政策的擁護人爲暴動的民衆處以死刑。我曾經聽人說過，在美國，那些偉大的人物常常差些偵探去跟蹤着任何的一個爲他們所不喜的人；如果這個人不是異常乖巧的，便終於不免被他們以種種的陰謀去把他擠到一個自甘退讓的情境裏去。他要就改變了自己的政策，以期投合於這些大人物的意見，要就被那些有權威的報紙宣佈他是一個不道德的人。在英國，這種方法固然還沒有發展到如此的田地，但這個時期也許是不遠了。民衆的熱情本來常常不免含有多少罪惡，就是在並無罪惡的場合上，牠們也常不免使一個不提防的人爲之震驚。例如尋常的民衆，人人都盼望政府去削減普通的經費，但當政府提出一件特殊的擲節的經濟政策之時，卻又每每不得羣衆的歡迎，因爲這件政策總要使某處的個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於是這些失業的人也容易得到羣衆的同情。中國在十一世紀的時代裏，曾經有過一位做着行政官吏的政治家，名王安石；他在說服了那時的皇帝，得到了他的信任以後，便着手去引入一種社會主義於實際的政治中。可是，在一個太過鹵莽的時機裏，他得罪了那時的文人學士（就是那時候的中國的諾斯克里夫（Noth-）

thelife) —— [就是在二三年前到過中國來遊覽的，中國各報稱之爲北巖爵士的那位英國的報閥；他是英國的最有名的泰晤士報的主人，現今的英國的有名的報紙和雜誌，大多數都是在他的操縱下的，現在已經去世了] —— 的報紙，終於被逼去位；併且從此以後，一直被中國的歷史家詬罵着，直至現今，纔有人出來替他說句公道話，而罵聲也逐漸減少了。

專門家的第四個缺點，是與前一個有關係的，就是他們每每太過看輕了實行政策所必須得到的人民的同意的重要，而漠視施行一種不受歡迎的法律的困難。醫藥的專門家，如果得到了權力，自然能夠計畫出種種的方法來撲滅那些傳染的病症，只要他們的法律能得人民的服從；可是如果他們所訂的法律前進得太快，和人民的平均程度距離得太遠了，那牠們就要得不到民衆的忠實的服從，牠們便等於虛設了。這便可以證明新政策之推行並不是一件絕無困難的事情。至於在戰爭時期裏的行政的容易，那是由於人民情願忍受鉅量的委屈，以期戰勝敵國；而在尋常的太平時代，則立法者找不到其他的目標，能具有如此強大的感動力的。

還有，專門家很不容易給與人們以稍稍怠惰和淡漠不關心的機會，勢且不免使人民常在緊

張的心境中。我們平時對於那些顯而易見的危險，總肯耗費相當的勞力去避開牠，但對於必須專家纔能看到的危險，就不免要漠不關心，不大肯耗費勞力去希圖避免了。我們都自以爲是喜愛金錢的，並且也知道對於日光的愛惜，每年裏將要替我們的國家省下以百萬計的金錢（所謂日光的愛惜大概指日裏多做些工作，以節省夜工所需費的電燈光等類的額外開支的意思），然而我們卻懶於如此做，除非遇到了如把牠視爲一種戰時的政策那樣的機會逼着我們不得不如是。我們之喜愛我們的習慣簡直較甚於喜愛我們的收入，併且常常把牠喜愛得比生命還要重些。而這種心情，據一個對於我們的一些習慣的害處曾經作過詳密的考慮的人看起來，便要認爲大不可靠的。所以那些政治的專門家在掌執了政權之後，將不免太過不顧慮於人們的惰性，而逼着他們去時時刻刻注意於一些爲他們向來所不大關心的事情；這樣一來，將不免使人民有不勝其煩之苦，而逐漸對這些專家失了好感。

也許大多數的專門家都不自知：假使他們獲得了行政的權力，他們的傾向於專制的衝動便會發展開來，再不會像他目前那麼樣地是一個和藹可親而又心志高抗的人了。一個人所遭遇的

情形，對於他的性情影響很大，沒有幾個人能夠減低這種的影響力。

爲了上面所說的種種原因，我們實在不能單獨倚靠於把政權移付於這些專家的政務官吏去逃脫目前所受於那些政治家的種種壞處。可是這總是勢所當然的，在我們今日的日趨於複雜的社會中，這些專家應當取得比現在所有的更多的影響力。我們目前的社會中，正有一種介於本能的情感與工業上的需要之間的衝突存在着。我們的人生與物質的環境都已經爲了工業主義而發生了一種急遽的變遷。而我們的本能則並沒有什麼可以假定的變異；併且我們又沒有預備好什麼東西去使我們的思想的習慣順應於這種改變了的情境。有些不大聰明的人把一些海獺養在他們的藏書室裏，便會看出當潮溼的天氣來了之時，這些海獺就要拿書室裏的書本去築成一條隄；因爲牠們本來是居住於溪河的岸上的，現在雖然移住於書室裏，牠們的築隄的本能卻依舊保存着。我們現在之對於我們的工業的社會，也差不多要如這些海獺一樣地不適應於我們的新的環境。我們的教育還教導我們去欽慕種種的荷馬（Homer）〔希臘的最偉大的史詩的作者，約生於西元前第九世紀〕時代的名人傳記裏是有用處的性質，而不去顧慮到在今日的時

代裏，這些性質早已變成了有害的，可笑的了。今日的每一個成功的政治運動之本能的宣傳，都是訴於人們的妒忌，敵意和憎恨，而永遠不會有訴於合作的需要的。這已經成為我們今日的政治方法裏所含有的先天的成分，也就是與工業的時代以前的習慣相符合的東西。我們只有憑着一種精思熟練的努力纔能夠改變人們的在這一方面思想的習慣。

人類本來有一種自然的趨向，總要把社會上一部分人所遭遇的災害歸咎於某人的惡意。當物價騰漲了之時，人們就要把牠看作由於享利息者的作怪；當工資降落了之時，人們又要認此為由於資本家的不好。至於當工資暴漲之時，那些資本家為什麼會陷於周轉不靈，而當物價暴跌之時，貿利者也是如此，關於這種情形的理由，便不是尋常的行路人所注意考問的了。這些人併且絕不會同時注意於物價和工資之一漲一落。假使他是一個資本家，他就去想望工資低降，而物價上昇；如果他是一個賺工資的人，那他就去想望相反的情形。當一個金融專家力圖解說享受利息者、商業組合和尋常的雇主們對於這事情關係極為微小之時，那他就要激怒了一切的人，正如在戰時一個懷疑於德國人的兇殘未必如此其甚的人之不免要激動公憤一樣。我們都不想一個敵人

被人家奪去了；當我們自己受着痛苦之時，我們總要找一個人來憎恨。我們如果去自承我們的受苦，是因爲我們是愚獸，那未免太過使人喪氣了；然而就人類全體說起來，這實在是一件真理。爲了這個理由，政黨除了特憎恨爲工具之外，將要找不到牠的推動力；牠必須拿一個人來做詬罵的目標。如果某人就是我們所受的苦惱的唯一的原因，那麼，就讓我們去責罰這個人，我們就可以快樂了。這一類的政治的思想的一個最高的榜樣，就是凡爾賽的和平條約（歐洲大戰以後，各交戰國在法國的凡爾賽宮所簽訂的和約；這和約的宣言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德國人和德皇威廉二世的身上）。可是，到了今日，大多數的人又在找尋着一條新的「罪羊」（古猶太人買來替代自身的罪孽的放生羊），以替代德國人了。

我要舉出兩部專注於國際的社會主義的立於互相反對的地位的書來說明這一個論點，這兩部書就是馬克斯（K. Marx）〔德國社會經濟學者，近代共產主義的大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的資本論，和沙爾脫（Salter）〔英國當代著名法政學者，生於一八五九年〕的協約國航務之管理。（沙爾脫爵士自然並沒有自稱爲一個國際的社會主義者，但他確然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們可以把這兩部書認為政治家的和專門家的代表著述，前者代表專注於經濟的變遷的政治家的方法，而後者代表專門家的專注於經濟的變遷的方法。馬克斯的目標是要創造一個政黨，這個政黨是終於要推翻其他的一切的政黨的；沙爾脫的目標則是要對於現存的制度裏的行政者加以改良的影響，併且拿一些以羣衆的公共利益為根據的論證來改變現今的社會上的公共意見。馬克斯斷然地證明今日的在資本主義之下的賺取工資者都受着可怕的劫掠。但他並不會證實，併且也沒有想去證實，在共產主義之下，這些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而這一點實是他的一個臆斷，從他的語氣和他的全書中的章節的排列就可以知道。無論那一個從一種無產階級的偏見出發的讀者，在他閱讀下去之時，也一定要在不知不覺中默認了這一個臆斷，併且永遠不會發見出牠是並不會證實於本書裏的。馬克斯又嚴重地否認倫理學上的理論，認為與社會的發展全無關係的；這社會的發展，他認為純粹以一種嚴酷的經濟的定律來進行，恰同李卡度（Ricardo）〔英國社會經濟學者：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和馬爾薩斯（Malthus）〔英國著名社會經濟學者，人口論的著作人：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的態度一樣。但李卡度和馬爾薩斯都以為這些嚴厲